

鲁迅先生的秦刻石鉴藏

近日,考古领域披露的发现于青海扎陵湖畔的“秦昆仑刻石”,引起了人们对秦代乃至战国时期秦刻石的广泛关注。其实,在100多年前的清末民初,金石拓本的收藏与研究曾是知识阶层的一项“顶流”活动。鲁迅先生也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,他的藏品中就包括秦刻石拓本,以及秦泰山刻石拓本。

对战国石鼓文的关注

鲁迅喜爱搜集金石拓本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。自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,鲁迅就热衷于搜集汉魏六朝的古砖瓦当和碑刻拓本,并研究上面的文字和图像。他曾在老家绍兴附近进行考察并拓碑。1912年赴北京教育部供职以后,则开始大量购求和整理金石拓本,并一直持续到他临终前夕。

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有鲁迅收藏的历代金石拓本5100余种,6200余张,数量之庞大,仅次于他的藏书数量。其主要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:一是刻石类,即碑碣、汉画像、摩崖、造像、墓志、阙、经幢、买地券;二是吉金类,即钟鼎、铜镜、古钱;三是陶文类,即古砖、瓦当、砚、印。

其中,石鼓文拓本是鲁迅购藏碑拓中年代最早的一种。鲁迅《壬子日记》(1912年)6月载:“二十五日,雨,傍晚霁。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,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,文多剥落,其一曾剜以为臼。中国人之于古物,大率尔尔。”“二十六日,上午太学守者持来石鼓文拓本十枚,元潘迪《音训》二枚,是新拓者,我以银一元二角五分易之。”……

学宫即孔庙,与国子监毗邻,庙中藏有周代祭器及石鼓。当时教育部拟在国子监设历史博物馆,此项工作属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责,鲁迅时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,因此前往视察。

这就是现存鲁迅日记中,有关石鼓及石鼓文拓本的最早记录。石鼓系先秦遗物,共10个,由坚硬的花岗岩凿刻而成,因其形似鼓,故俗称石鼓。最早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发现于宝鸡陈仓。石鼓上篆刻着秦始皇统

一文字前的大篆,即籀文,通称石鼓文,其内容系君王贵族们的征旅渔猎,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状况。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,故又称石鼓为猎碣。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目前学界主流倾向于认为石鼓文系战国时期秦国所刻。

鲁迅日记中的“元潘迪《音训》二枚”是指《石鼓文音训》碑的拓本。北京故宫的宁寿宫,现改作“石鼓馆”,馆中除了陈列着石鼓原石十件之外,还有一块碑刻,即《石鼓文音训》碑。此碑刻于元代至元五年(1339年)五月,由潘迪整理并书丹,碑额为篆书“石鼓文音训”五字,音训的内容为石鼓文的释文、音义及宋时郑樵、施宿、薛尚功、王厚之数家对石鼓的排序。

《全元文》有这位潘迪的小传:“潘迪,字履道,一字庸民,元城(今属河北)人。历监察御史、国子助教,升国子司业、礼部尚书。以正议大夫、集贤直学士致仕,著有《春秋南学述解》《六经发明》《格物类编》。”潘氏据旧拓本考订石鼓文字,所缺之字,均以“○”标识。并在跋尾简述了石鼓的流传经过:“右石鼓文十,其辞类风雅,然多磨灭不可辨。世传周宣王猎碣初在陈仓野中,唐郑余庆始迁之凤翔。宋大观中,徙开封。靖康末,金人取之以归于燕。圣朝皇庆癸丑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。”《石鼓文音训》刻成之后,影响极为深远。明清至民国时,学习篆书者多取《石鼓文音训》通晓其意。有不少石鼓文善本将《石鼓文音训》拓本附装于后。

由于风化剥落与人为损坏的原因,刻石随着时间推移,越到后期存字越少、字迹越模糊。所以刻石拓本一般早期更佳,后期(即新拓者)较差。石鼓文宋代拓本上尚有四百多字,到清末时“新拓者”就只剩二百多字了,“曾剜以为臼”的一鼓,每行只

存下边四个字,而更有一鼓,已经一字不存。由于1912年所购石鼓文拓本十枚,元潘迪《音训》二枚,是“新拓者”,释读有一定的困难,所以鲁迅《乙卯日记》(1915年)3月有下述记录:“六日,晔。……下午往留黎厂买《金石契》附《石鼓文释存》一部五本,《长安获古编》一部二本,共银七元。……”《金石契》与《石鼓文释存》均为清代书法家张燕昌(1738-1814)所著。张燕昌曾至宁波天一阁(藏有北宋拓石鼓文善本),摹石鼓文。事隔三年之后,鲁迅购买“《金石契》附《石鼓文释存》一部五本”,表明他对石鼓文的研究仍在进行中。

持续求购秦泰山刻石拓本

除了石鼓文,鲁迅还收藏有秦泰山刻石的拓本。但与搜集石鼓文拓本主要集中在1912至1915年之间不同,鲁迅对秦泰山刻石拓本的购求活动持续了二十年之久。

鲁迅《甲寅日记》(1914)“甲寅书帐”记有:12月27日购“泰山秦篆二十九字一册”,价银二角五分。三年后,《丁巳日记》(1917年)4月载:“一日,晴。午后往图书馆访子佩。往留黎厂付表拓本,并买《泰山秦篆残石》一枚,《李氏像碑阴》一枚,《成公夫人墓志》一枚,共银二元。……”又十六年后,1933年日记的书帐载:当年1月15日“景印秦泰山刻石一本”,价银一元二角。“景印”即今之“影印”。

秦泰山刻石分为两部分,前半部分“始皇刻碑”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(前219年),后半部分“二世诏书”刻于秦二世元年(前209年)。两刻辞均为李斯撰文并书丹,属小篆书法作品。秦泰山刻石原石四面均有刻词,总共222个字。现仅存秦二世诏书

10个残字,即“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”,又称“泰山十字”。

据文献记载,宋政和四年(1114年)刻石尚在岱顶玉女池上,可认读的有146字,漫灭剥蚀了76字。明嘉靖年间,此石被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,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,即“斯臣去疾御史大夫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”。清乾隆五年(1740年)碧霞祠毁于火,刻石遂失。嘉庆二十年(1815年),时人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2块,尚存“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”共10个字,遂将残碑嵌于岱顶东岳庙壁上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,东岳庙墙坍塌,残石被移到山下岱庙。

秦泰山刻石传世拓本当以明人无锡安国所藏宋拓本为最早,计存165字,另一本存53字,均流至日本。秦泰山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,现存清聂剑光摹刻的明拓本29字和徐宗干摹刻的旧拓本29字两块刻石,均陈列于岱庙碑廊。所谓摹刻拓本,并非从原石拓制,而是依据原石拓本复制刻石之后再拓制,故与真迹相差较远。鲁迅1914年所购“泰山秦篆二十九字一册”,价格低廉,仅二角五分,大概率是摹刻拓本。鲁迅应是对此拓本不满意,所以后来持续购求。1933年1月15日购买影印秦泰山刻石一本,价银一元二角,比较昂贵,应是善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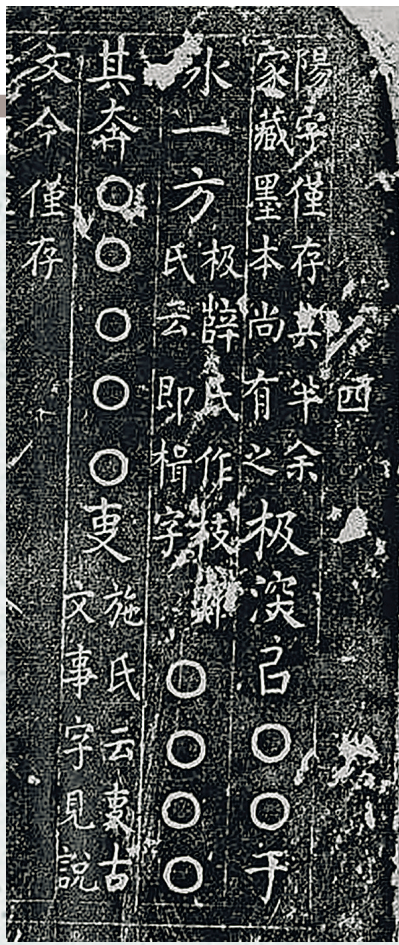
鉴藏对鲁迅的三方面影响

鉴藏秦刻石对鲁迅形成的影响,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。首先是文学方面。1926年和1927年,鲁迅先后在厦门大学、广州中山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,在课程讲义(后来定名为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的第五篇《李斯》中,他就以《泰山刻石文》为例,专门谈到李斯的文采:“二十八

年,始皇始东巡郡县,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,刻于金石,以垂后世。其辞亦李斯所为,今尚有流传,质而能壮,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。如《泰山刻石文》:皇帝即位,作制明法,臣下修饬。二十六年,初并天下,罔不宾服。亲巡天下黎民,登兹泰山,周览东极。从臣思述,本原事业,祇诵功德。治道运行,诸产得宜,皆有法式。大义休明,垂于后世,顺承勿革。皇帝躬圣,既平天下,不懈于治。……昭隔内外,靡不清净,施于后嗣。化及无穷,遵奉遗诏,永承重戒。”

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从汉文字的产生讲起,到汉代司马相如、司马迁为止,一共十篇。李斯能单独占据一篇的分量,可见鲁迅对其文学贡献之高度重视。对于李斯所撰《泰山刻石文》,鲁迅评价其“质而能壮,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”,可谓极其精当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质而能壮”即文辞朴实洗练而意蕴丰厚深刻,正是鲁迅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不应忽略《泰山刻石文》对鲁迅的直接影响。

其次是学术方面。鲁迅对金石拓本的搜集和整理,本身是他在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。他在这方面留下了相关手稿3500余页之多,编出了《六朝墓名目录》《六朝造像目录》《唐造像目录》《石刻目录》等,其学术贡献不容忽视。鲁迅还曾计划在此基础上编著有关中国字体变迁史的专书,后因故未能实现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《寰宇贞石图》的整理改编。《寰宇贞石图》是清末杨守敬所编石刻图录总集,其中第一图就是石鼓文。由于搜集的石刻拓片未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,鲁迅认为它“极草率”。后见它本,又颇有出入,其目录亦时时改刻,莫可究竟”。经鲁迅整理过后,此书目面目一新,成为金石研究可靠而重



元代《石鼓文音训》(清末民初拓本)(局部)。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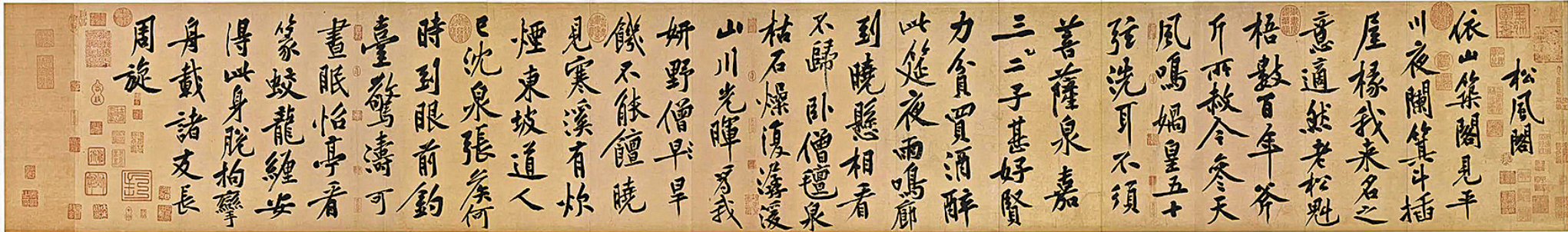
要的资料。若没有对石鼓文拓本的鉴藏与研究,是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的。

第三是对鲁迅书法的影响。石鼓文与秦泰山刻石在我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。石鼓文为大篆杰作,古茂遒朴,唐张怀瓘《书断》称其“体象卓然,殊今异古;落落珠玉,飘飘缨组;苍颉之嗣,小篆之祖。”明清以来,好古之士多醉心于石鼓文,习篆亦多从中取法、临摹,研究,奉其为篆学津梁。清嘉庆至民国间,从石鼓文中悟其理、通其法的书家尤多,如俞樾、翁同龢、吴昌硕等均有临石鼓或集石鼓文字的佳作问世。作为秦小篆代表作的泰山刻石,则以强劲平稳之骨力,时出飞动流走之生机,张怀瓘《书断》称其“画如铁石,字若飞动”,“其势飞腾,其形端严”,“作楷书之祖,为不易之法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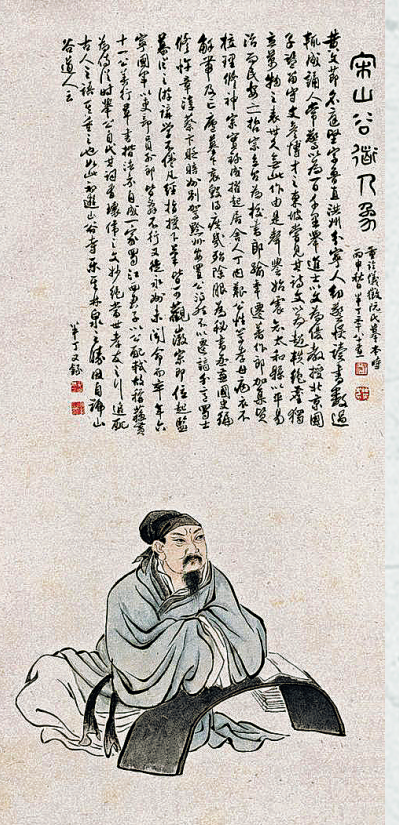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整理金石拓本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“抄碑”,包括抄录文字与临写字形。他从秦代抄到隋唐,从篆书抄到隶书,又由隶书抄到楷书、行书。郭沫若评价鲁迅书法:“融洽篆隶于一炉,听任心腕之交应,朴质而不拘挛,洒脱而有法度,远逐唐宋,直攀魏晋。”这种书法风格,很难说没有石鼓文与秦泰山刻石的潜在影响。

张德斌

黄庭坚:“不俗文人”山谷翁



北宋 黄庭坚《松风阁诗帖》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

陈半丁绘黄庭坚像。

黄庭坚生于北宋庆历五年六月十二日(1045年7月28日),号山谷道人,洪州分宁(今江西修水县)人,是北宋著名的诗人、词人、散文作家、书法家。他的诗词与苏轼齐名,史称“苏黄”;书法在“宋四家”(苏黄米蔡)中排名第二。

作为宋英宗治平四年(1067年)进士,宋神宗年间,黄庭坚任过地方上的县官、学官。哲宗即位后,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,参与修撰《神宗实录》。后因文字之祸被贬黔州(今重庆彭水县)、戎州(今四川宜宾市),最后在宜州(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)贬所去世。

黄庭坚的性格表面随和豁达,爽朗明秀,善于与人相处,但内心却很刚毅。黄庭坚自称“痴黠各半”,也就是一半耿直,一半通达。苏轼评价“山谷真率如初生之犊”。南宋汪应辰评价他“疏通乐易,而其中所守,毅然不可夺”。清代陈廷焯则以“倔强中见姿态”六字概括其性格与创作。今年是黄庭坚诞辰980周年,愿以一文描摹与纪念这位外柔内刚的不俗文人。

天性率真 内心倔强

黄庭坚为后世留下了2000多首诗词。读其诗想见其为人。从他的诗文中,我们能清晰地感知一个有思想、不落俗、性格鲜明的文人黄庭坚。

三岁看老。黄庭坚青少年时所作的三首诗最能体现其天性。七岁时作《牧童》诗:“骑牛远远过前村,短笛横吹隔陇闻。多少长安名利客,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以悠然自得的“牧童”为意象,直抒胸臆,表达思想,展露真情。八岁时所作《送人赴举》诗:“青衫乌帽芦花艇,送君直上明君前。若问旧时黄庭坚,滴在人间今八年。”一个“滴”字,表达的是自信自负。二十三岁出仕之前所作《清明》诗: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垅只生愁。雷惊天地龙蛇蛰,雨足郊原草木柔。人乞祭余骄妾妇,士甘焚死不公

侯。贤愚千载知谁是,满眼蓬蒿共一丘。”表达诗人对入仕后的人生思考,奠定了他此后人生哲学持节与超越交融的主基调。

黄庭坚入仕后,率真性情常常表现为恃才傲物、不同流俗,因而屡屡得罪权贵。二十三岁时他刚到叶县任职,就因为没有准时报到,受到三朝重臣富弼的责罚。三十九岁在德州德平镇任上又得罪了德州通判赵挺之,多年后遭到报复。在编修《神宗实录》时,由于坚持史家“直笔”传统,客观记录历史,新党掌权后从中摘出千余条内容,控告他诬蔑影射从中搞出。面对高压,黄庭坚却坚持“用铁龙爪治河,有同儿戏”的客观记录。面对“铁龙爪”文字狱,他始终“凡有问,皆直辞以对”。

客观公允 理性包容

黄庭坚生活的时代,正是北宋新旧党争激烈的特殊时期。黄庭坚属于司马光、苏轼的旧党。旧党上台后,对新党政策全盘否定,对王安石本人也全盘否定。但黄庭坚没有人云亦云,他能够比较客观地去评价变法和王安石本人。在其所作的《神宗皇帝挽词》中有对变法的肯定:“钓筑收贤辅,天人与圣能。辉光唐六典,度越汉中兴。”在《跋王荆公禅简》中有对王安石的肯定:“余尝熟观其风度,真视富贵如浮云,不溺于财利酒色,一世之伟人也。”黄

庭坚对王安石的书法艺术也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“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,出于杨虚白”。

黄庭坚还对党争中以人划线的做法表达不同意见。《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》第四首云:“成王小心似文武,周召何妨略不须。要出我们下,实用人材即至公。”借西周的历史,说明政策可以有不同,重要的是出于公心,摒弃党派门户之见,唯贤才是举。其客观理性,可见一斑。

淡泊平和 随遇而安

黄庭坚推崇“超世而不避世”的思想,既有儒家济世理想,又具道家旷达。青年时代赴京应试,众人皆传其必中榜首,揭榜时他却名落孙山。同窗痛哭流涕,唯独他“自饮其酒,饮罢窗榜,毫无沮丧”,被赞性格坚强沉稳。黄庭坚晚年屡遭贬谪,依旧处变不惊,乐观豁达。第一次被贬的诏令下来后,左右的人都哭起来,而黄庭坚神色自若,倒头便睡。亲朋好友担心他想不开,前来慰问,黄庭坚笑答:“四海皆兄弟,凡有日月星宿处,无不可寄此一梦者。”

被贬黔州时,他买田种菜,经营居室,寄情山水,夜墨挥毫,自我调节。他办私塾授课讲学,“日为我讲一大经一小经,夜与说老杜诗”,将逆境转化为传播文化的机遇。在宜州最后的岁月里,他与宰牛的

案板相对,焚香读书,用三文钱买的鸡毛笔为朋友写跋,把在城墙上淋雨当成平生快事,将困顿生活过成了诗。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,黄庭坚创作不辍,诗词写作和书法创作均达到新高度。诗歌写作上实践“点铁成金”“夺胎换骨”的诗学主张,佳作不断;书法创作则最终形成“中宫收紧、四缘发散”的辐射式书法这一崭新的结字方法,流传后世的书法珍品《砥柱铭卷》《松风阁》《寒山子庞居士诗》等都是贬谪期间所作。

孝亲爱友 重情重义

黄庭坚重情重义,苏轼赞叹他“孝友之行,迥配古人”。他的孝行被载入《二十四孝》,名为“涤亲溺器”。虽官至从五品,他仍坚持每日为母亲清洗便桶,并说孝敬父母是我的本分之事,无论我是否当官,都心甘情愿为了母亲的健康而去服侍她。母亲去世后,他日夜守候在墓旁,哀伤恸哭,其孝心感动了族人与乡邻。

他对友情也十分珍惜。苏轼入狱时,他奔走营救;苏轼被贬海南,他仍每天早晨起来,穿好衣服戴正帽子上香,很恭敬地作揖施礼。秦观去世时,他写《千秋岁》悼念,词中“波声万顷珠沉海”感人至深。流放途中偶遇秦观灵柩,他握着秦观之子秦湛的手痛哭,赠银二十两助办丧事。

黄庭坚的许多诗作都是写给友

人的,他把诗当成日常往来的书信,共同分享生活中的欢乐与悲哀,“次韵、和答、有赠、有怀、寄”频繁出现在黄庭坚的诗中。略举三首为例。《次韵裴仲谋同年》是写给好友的和诗:“交盖春风汝水边,客床相对卧僧毡。舞阳去叶才百里,贱子与公俱少钱。烟沙篁竹江南岸,输与鸂鶒取次眠。”《夏日梦伯兄寄江南》是写给兄弟的诗:“故园相见略雍容,睡起南窗日射红。诗酒一年谈笑隔,江山千里梦魂通。河天月晕鱼分子,榭叶风微鹿养茸。几度白沙青影里,听嘶响马自枵枵。”《寄黄几复》是写给同乡好友的诗:“我居北海君南海,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。持家但有四立壁,治病不遑三折肱。想得读书头已白,隔溪猿哭瘴溪藤。”这些诗都饱含了浓浓的友情、乡情、手足情。在贬谪期间,他与当地友人诗酒唱和,互相扶持,体现出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挚。

黄庭坚生前曾倡导写诗做人要“不俗”,他说:“余尝为诸子弟言,士生于世可以百为,唯不可俗。或问不俗之状,余曰难言也。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,临大节而不可夺,此不俗人也。士之处世,或出或处,或刚或柔,未易以一节尽其蕴,然率以是观之。”一个人如果不注重人格修养,必然利欲熏心,染上俗气——黄庭坚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“不俗”。

去世后,黄庭坚谥为“文节”。九

百多年过去,今天的我们仍能从他的诗文、书法中感受到那份外柔内刚、超凡不俗的凛凛文人风骨。

黄植群